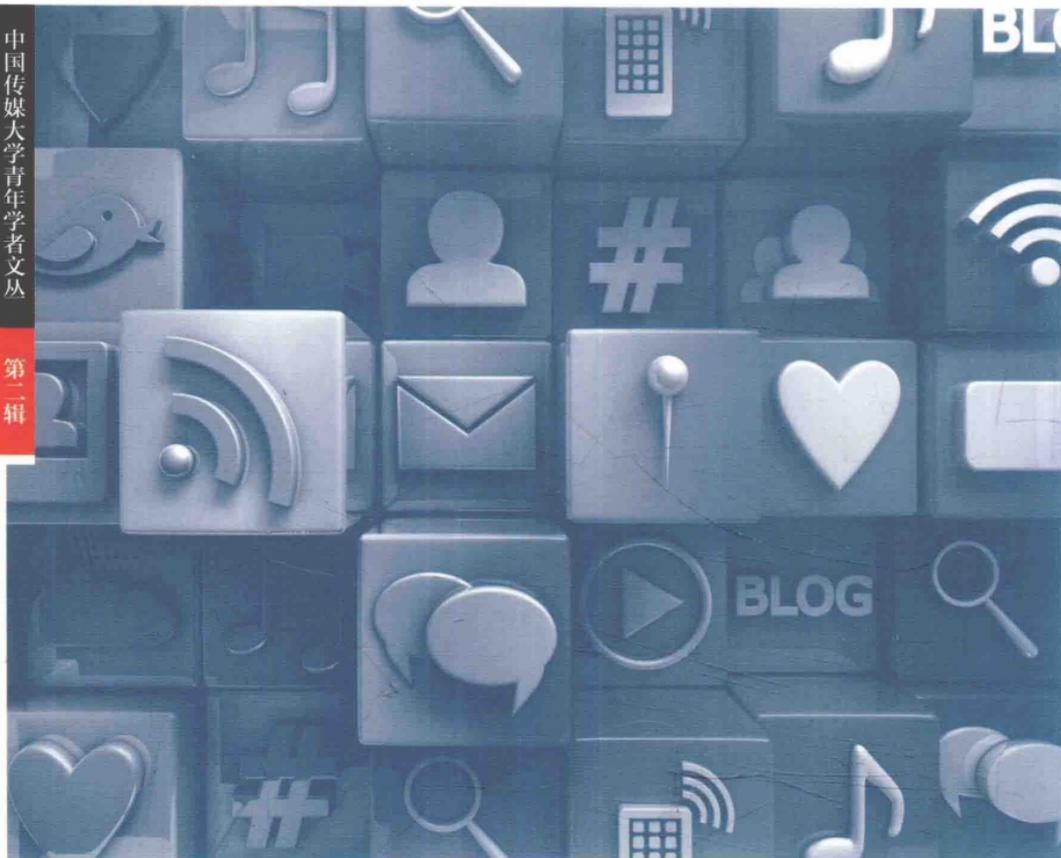


中国传媒大学青年学者文丛

第二辑



数字时代中国 “Y世代”青年的 公民参与

王蕾 / 著

博雅·实践调研
系列：“世代”的时代与技术特征
系列：手机公民的“积极参与观”

Chinese Gen Y'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青年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Y世代”青年生长于社会转型期,赶上了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浪潮,是与数字化媒介生态环境相伴相生的一代。“Y世代”青年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中坚力量,在被寄予期望的同时,也承受着外界对其“政治冷漠”“公共不参与”“沉迷娱乐”“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诸多方面的诟议。

本书承接中西方对公民参与理论思想概念上的发展革新,在情境思辨和实践调研的双重基础上不断优化青年公民参与的理论框架,试图在当代社会环境下构建一种“积极的参与观”,说明“参与”是时代需求,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的主观意识追求。

“Y世代”并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词语,它承载着当代青年的时代特征和技术特点,置身于网络社会的青年亦会运用自身所拥有的技术优势和进步观念,成为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事业中最为闪亮的光芒。



扫一扫,加入本书读者圈,
与数千书友交流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二维码

上架建议:新闻传播

ISBN 978-7-5657-2152-6



9 787565 721526 >

定价: 59.00 元

中国传媒大学青年学者文丛

第二辑

数字时代中国 “Y世代”青年的 公民参与

Chinese Gen Y'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王蕾 / 著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字时代中国“Y世代”青年的公民参与 / 王蕾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8.3

(中国传媒大学青年学者文丛·第二辑)

ISBN 978-7-5657-2152-6

I. ①数… II. ①王… III. ①青年—公民—参与—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D6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6596 号

数字时代中国“Y世代”青年的公民参与

SHUZISHIDAI ZHONGGUO “YSHIDAI” QINGNIANDE GONGMINCANYU

著 者 王 蕾

策划编辑 蒋 倩

责任编辑 蒋 倩

封面设计 拓美设计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0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2152-6/D·2152 定 价 5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总序

时值中国传媒大学成立 60 周年之际,中国传媒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资助项目正式选定了十部支持专著,这是我校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又一成绩。

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是为了落实学校科研支持政策,更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2014 年,李克强总理与历年国家杰出青年科研基金获得者代表座谈交流时曾提到,人才特别是优秀青年人才是国家科技实力、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代表着国家创新的未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对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具有重大意义。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和国家 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中国传媒大学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学术发展也是我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建校 60 年来,我校在科学研究方面产出了大量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在信息传播领域,我校广大教师正确面对我国信息传播事业飞速发展过程中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迎难而上、克难攻坚,始终保持着饱满的科研热情,坚守着学校的殷切期望,及时、准确地把握国家提供的战略契机,以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信心面对挑战、迎接挑战,积极开展多领域、内容丰富的科研工作,收获了累累硕果。在 2012 年教育部组织的全国学科评估中,我校新闻传播学、戏剧影视学两个学科均排名第一。

目前我校的3个学部(新闻传播学部、艺术学部、文法学部)、1个中心(协同创新中心)和5个直属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广告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MBA学院)是文科科研和艺术创作的主要力量源泉。同时,学校文科方面还拥有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2个国家重点学科,传播学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3个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动画学2个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等部级研究机构13个和校级科研机构40个,在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近年来,我校在人文社科领域先后有2人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人入选“长江学者”讲座教授、3人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5人入选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人次荣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人次荣获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更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荣获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含金量较高的奖项。众多奖项和数字的背后,凝聚的正是全校思想活跃、朝气蓬勃的广大青年教师夜以继日、笔耕不辍的成果,他们是真正帮助我校文科科研日益发展壮大的薪火相传的主力军。这支主力军的成长得益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校立足长远,着力于对广大青年教师进行有计划、有目标的专业培训,加大对青年教师科研项目的经费投入,鼓励青年教师进行交叉学科项目的科学研究。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的设立,有效调动了青年教师的科研积极性,整体提升了我校人文社科的科研氛围与科研能力;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系列讲座,积极拓展广大师生的学术视野;研究《艺术创作与获奖评价体系》,将科研与艺术创作有效结合,激发广大教师艺术创作的热情;研究《重点学科指标评测体系》,将我校的优质学科与国内外顶尖高校的相应学科进行深层对比,巩固我校两个优势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打造《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手册》,方便教师全面了解科研工作情况;建设完成文科科研成果库(一期工程),共收集信息传播领域

论文 15,500 余篇、著作 3,258 册、研究报告 730 余篇,形成了我校自建校以来最为完整的科研成果文献体系;本着“高标准、精投入”的原则,集中一批优秀科研人才,引导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围绕全媒体、大数据等热点领域积极开展科研工作,营造了一个砥砺切磋的良好学术环境,促成了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生。

另一方面,我校广大青年教师努力开拓创新,将现代理论有机融合于具体实践之中,在变化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谋变化,不断寻找立意新颖的科研课题,以蓬勃向上和不断进取的青春锐气、以孜孜不倦和奋力前行的勇气,扎根于文科科研工作,并不断茁壮成长。青年教师在学校“钻研、精研、深研”的方针指导下,凭借着旺盛的科研热情,在一系列科研、教学比赛和国际学术拓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此次青年学者出版资助项目就是这些科研成果中的一部分。也正是在优渥的科研鼓励政策的鼎力支撑下,才有了一批 30—45 岁的优秀青年学者倾心无忧,精心钻研,用心谋划,专心致学,大胆施展才华,安心科研工作,最终促成了“中国传媒大学青年学者文丛”的顺利面世。

学校文科科研的发展离不开青年教师的成长,学校管理机制的完善助力于青年教师的进步。希望我校广大青年教师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畏艰险、勇于创新,不断探索前行!

是为序。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

廖祥忠

2015 年 12 月 8 日

序

王蕾早在十年前就报考了我的硕士。本科就读计算机通信专业的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稚气未脱的小姑娘,这让我对她在专业领域的发展多少有些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了她身上潜藏的那股不服输的勇气,和难能可贵的毅力与坚持。她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业,并且漂洋过海,用一年多的时间留学美国,为博士论文的框架建构及后期调研与写作打开了视野,寻找到更多的参照。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她在毕业答辩时提交的那份致谢词——足足有五六千字,大概是我所读到的篇幅最长的致谢了。我想那是她对自己寒窗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她对相关领域各位前辈、同仁的致敬,更是她对这项浸透了汗水与心血的研究的感言!

当代中国的语境之下,“公民参与”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想象空间的研究领域,而青年作为公民参与的主体与后备力量,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无疑更是值得考察与探讨的问题。王蕾以此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既反映了其学术兴趣和专业志向,也体现出她对相关议题的长期关注与敏锐感知。

但这的确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题目。首先是对相关概念、理论的历史梳理。何谓“公民”,什么是“参与”,以及相关情景、背景之下的“政治”概念,还有对“Y世代”“青年”等关键词语及特定内涵的界定等,都需要展开系统的考察与论证。其次是如何从这些西方政治学、社会学及传播学领域的核

心理念出发,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展开具有创新性的、接地气的考察,以期得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数据与判断,实现有意义的“跃迁”。最后,如何评价、反思中国青年在公民参与行动中的角色与未来,更是具有挑战性的话题,需要研究者在理论建构、实践话语及学术立场上均具备相当的积累、洞见与勇气。

如果以上述标准观照,严格来说,此项研究还存在相当的拓展空间。从王蕾的自述中,可以窥见其艰难的探寻过程和不懈努力。正如作者所言,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身负各种期望的青年群体是否丧失了‘公共’意识,是否自我消解了‘参与’能力,是否对社会政治议题漠不关心?他们是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网络和各种数字终端平台又在其中起到何种作用?……”正是这一连串的疑问,构成了研究的现实关切。

值得肯定得是,作者至少在前两个层面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形成了基于文献检索和一手调研的理论搭建与本土回应,如关于“Y世代”的中国语境的分析,为“谁是青年”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解读;而基于实证资料的“积极的参与观”等结论的形成,也为下一步的探索拓开了疆域。相信假以时日,王蕾博士会在学术之路上走得更远,并且不忘初心。

龙 耘

2017年8月于北京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缘起 / 1	
第二节 主要研究文献综述 / 6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9	
第四节 研究架构与方法 / 22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25
第一节 青年公民参与理论 / 25	
第二节 相关理论扩展 / 47	
第三节 关键概念 / 55	
第二章 数字时代中国青年公民的参与环境	73
第一节 从社会变迁视角看中国青年参与演变史 / 73	
第二节 不断发展的参与环境 / 80	
第三节 影响青年参与的因素 / 107	
第三章 实践调查——微信使用、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	116
第一节 大学生微信使用和社会资本对其公民参与的影响 / 116	

第二节 调查讨论与小结 / 132	
第四章 实践调查——数字时代青年志愿者的服务持续性……	135
第一节 数字时代青年志愿者志愿服务持续性的原因 ——对 12 名青年志愿者的访谈分析 / 135	
第二节 调查讨论与小结 / 156	
第五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161
附录 1	167
附录 2	174
参考文献	177
后 记	194
编者的话	201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缘起

2012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成功之路,光明之路,希望之路》的文章,文章里指出,“民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就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党的十八大还特别将政治体制改革单独列出,作为报告的重要部分进行阐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并提出“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以此强调全民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熊培云,2014)。在信息通信技术不断更新的历史阶段,很多人认为,网络中的参与作为一种直接性的民主形式,是现实中制度性的代议制民主形式的有益补充,二者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飞速发展,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全面步入了信息化、网络化以及数字化的新新媒介时代(保罗·莱文森,2011)。在新新媒介时代,人们可以打破传统的种种限制,基于爱、正义、共同的喜好和经

历,灵活有效地采用多种社会化工具,一起分享合作,乃至展开集体行动,“湿”的概念十分形象地诠释了人们这种基于网络的共同体验,可以说,互联网是中国的加湿器、未来的加湿器(克莱·舍基,2011:8)。据《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超半数网民使用微博、SNS社交网站等新兴社交媒体平台。报告显示,网民主要为集中于15岁至35岁之间,以学生为主的青年群体。另据《2011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显示,25周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在总体网民中占主要地位,是使用网络应用较为活跃的群体,该群体中使用搜索引擎、浏览网络新闻的比例占网民总数的70%以上,他们也是使用博客、论坛、社交网站和即时通信的主要群体。以上情形表明,青年群体在当代社会变迁的形势下,日趋扮演着网络政治参与的生力军和主力军角色(徐选国 & 李月圆,2012:11)。

作为民主社会的衡量尺度,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青年,是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庆,2012:5)。当代青年是伴随着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成长起来的一代(Livingstone, 2002),他们所拥有的许多知识都源于媒介,而好的媒介则提供了政治参与的平台。可以说,青年是肩任民主责任感新一代的“参与型公众”(Dahlgren, 2009: 81)。在网络时代的背景下,一方面,青年可以通过专门的政治网站、微博、社交网站或其他即时通信途径来获取政治或社会公共事务信息,参与时事讨论,表达诉求和抒发情感,这对于维护政府部门的正常运行、有效调解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等起着十分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当前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在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出现了环境污染、贫富差异、资产重组及生态危机等不能即刻化解的一系列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竞争压力容易让当代青年产生种种焦虑和恐惧,他们要么对政治和政治参与毫无兴趣,要么受广袤无垠的网络世界中一些不良信息的影响,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做出不利于自身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行为(陆士楨,2012: 5)。

兰斯·本奈特(Lance Bennett)认为,青年的政治参与范式无外乎有两

种:参与范式(the engaged youth paradigm)和非参与范式(the disengaged youth paradigm)。参与范式强调对青年言论表达的赋权,他们可以根据自身观点作出有建设性的抉择;而非参与范式则强调青年对传统政治活动(如选举)的参与和对公共时政新闻的关注降低。关于青年不关心政治、政治冷漠(civic or political apathy)的论调在中西方的相关研究中一直存在,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其观点的依据主要有两方面:(1)从青年的主观意识层面来看,青年对“政治”或“政治参与”有种刻板的印象。青年对政治和政客的信任度不高,他们对于正规的政治系统有种与生俱来的疏离感,且一般很难对参政者表示认同,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参政议政的人通常年长且不会深入地了解青年人的生活状况(Dahlgren, 2007:5)。(2)从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客观条件来看,一方面,青年的上网行为仍是以娱乐为重点,尤其是以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价值论上的多元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为精神内核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容易在青年中塑造一批“新新人类”(朱子超, 2005: 24)。他们崇尚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以及享乐主义,其公民身份被边缘化。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图景变得更多元化、细分化。特别是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总体上已由工业社会渐渐步入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当然也进入了德国学者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有学者分析,风险社会给当前中国带来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矛盾、阶层分化和规范弱化三个方面(杨晓虎 & 傅菊辉, 2013: 21)。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和融入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已蓄积了更多的资本打造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同时也进入了矛盾的多发期。新旧经济模式、政治体制、文化观念随处可见,现实社会贫富分化、城乡差别、区域分割构成了社会转型的沉重羁绊(孙立平, 2009: 12)。生活在冲突和利益纠葛之中的被誉为“祖国栋梁”的青年群体倍感压力、生活幸福感严重受挫。其中一部分人不是沉迷于虚妄的个人想象空间中逃世厌世,就是浸淫在浮躁萎靡的享乐世界中寻求片刻心灵的寄托,没有充分地利用好网络这个重要的通道行使职责和履行义务。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威权模式”下,国家和政党完全主宰了社会力量,只存在“威权体制”导向下的“政治动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谓的“政治参与”抑或是“公民参与”不过是当权者用来构筑其政治合法性的工具,并不具有影响政策的实质性意义(赵刚印,2010:2)。有些学者甚至拒绝将“公民”或“参与”等概念运用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情境之中,他们认为当下的中国只能归为“臣民社会”,客观上还不具备“参与”的条件。毫无疑问,这种理念和导向是狭隘的、有失偏颇的。(1)民主是值得追求的,而参与是民主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者一直是把民主作为重要政治目标加以追逐的(郭小安,2011:2)。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邓小平也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十四大至今的历届党的报告都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信息技术的进步逐渐推动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形成,从而使政治制度能够表现出真正的民主(郑永年,2014:109)已成为学术界一种常态的思维方式。多年来,中国公民已摸索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参与形式,特别是随着网络信息社会的来临,公民参与已经显著地发生于数字化公共领域;网络公共讨论或网络舆论场形成了一种社会压力,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我们不可简单地套用西方国家技术和公民参与的理论路径,模式化地认为技术进步和民主政治是直接的正相关关系,而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对“民主”和“政治”进行合理化分析。一方面,民主是一个程度性的问题(王绍光,2008:94),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对于中国更为现实的方案,是让国家和社会力量产生互动,以递归的关系逐渐地改造着彼此;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广泛的社会个体登上政治舞台,借助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参与流动性政治和生活政治(师曾志 & 胡泳,2014:172),此时的“政治”逐渐有了“社会”的维度,也有了“公共”的内涵,并且对“参与”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社会运动,参与的内核渐渐与个体的生活实践以及媒介生态环境息息相关。(2)我国网络社会的参与实践,确实对现

有政权体系的发展起到了良性的促进作用。比如,网络公共讨论通常能赋予领导人一种权限来发起政策倡议并实施它们(郑永年,2014:186)，“强国论坛”的建立、“孙志刚事件”以及若干起官员腐败事件等表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正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政治开放、政治透明和政治责任制。(3)自中国2001年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开始,全球化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外部环境和机遇。中国也不得不持续调整自身来适应国际规则的要求。尽管对外界有各种抗拒,但中国在与国际社会的频繁互动中,也在逐渐地被国际规范社会化,这其中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郑永年,2014:175)。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现在很难忽视世界舆论,因为我国现如今已经是全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发展也日益依赖于世界市场。(4)日益繁多的网络公民社会参与源于现阶段民众的需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古人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这里面包含了一种朴素的政治观,即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人会有精神需求(胡正荣,2012)。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觉醒以后,就会产生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的需求。纵观当前中国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草根的社会参与或“围观”行为,都带着浓厚的物质性和现实性,也就是说,参与仅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或推动现行政策的改革。所以,国家政府和商业市场领域从某种程度上是欢迎这种类型的公民参与的。

综上所述,网络参与或公民参与对我国的良性发展是必要的,是有意义的。我们只需结合时代的发展趋势,适当地转变对“公民”“参与”“政治”等观念的看法,将其放在社会情境中加以重新思考和诠释,这样的“公民参与”便是有意义和有积极作用的。特别是对于在传统政治参与领域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当代青年,对他们的社会公共参与应该给予肯定和鼓励。认可青年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和行为实践会给当代青年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增添助推剂。虽然网络世界常渗透着暴力、谣言和谩骂,但随着合理有序的参与体系的日益完善、国家与社会越来越多的沟通互动和相互改造以及公民良性参与实践的增多,“善治”的梦想终将在实践中成为现实。本书以中

